

# 年轻人缘何“躺平”？

## ——社会压力对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

李威威, 龙腾

(广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广东广州, 510530)

**[摘要]** 基于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探讨社会压力对年轻劳动力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显示,工作保障压力的升高及对自身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认同显著削弱年轻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而社会排斥压力对年轻劳动力就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随着年龄增长,劳动力因家庭经济负担加重而倾向于规避失业,就业意愿增强。此外,年轻男性劳动力因社会评价压力(如“面子”)更关注经济社会地位,社会压力对其就业意愿的负面效应更显著。独生子女的就业意愿低于非独生子女的,而户籍限制并非城乡年轻劳动力就业意愿差异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劳动力; 就业意愿; 工作保障; 社会压力

**[中图分类号]** C9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25)02-0069-09

### 一、引言

“躺平”一词意指妥协与放弃,源于消极的生活态度和不作为,职业目标表现为“向下突破职业天花板”<sup>[1]</sup>。在社会压力较大或个人价值难以实现时,年轻人易产生消极迷茫情绪,进而接受“躺平”理念,成为“躺平族”。“躺平”言论严重偏离传统主流价值观念,而年轻人这种消极放任的生活态度也引发了学术界对“躺平”现象的持续关注。

年轻人选择“躺平”本质上是对行业内卷化的消极应对。当他们发现职业发展渠道过于狭窄,且通过自身努力难以突破时,自愿性失业便成为一种理性的个人选择。“躺平”的利弊尚难定论,作为“躺平”方式之一的自愿性失业背后的经济与社会根源值得深入探讨。青年自愿性失业现象并非中国所特有。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社会发展陷入长期停滞,部分年轻人因内卷焦虑而失去奋斗热情,失业意愿升高,逐渐成为不参与社会活动、自我封闭的“蛰居族”<sup>①</sup>。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尼特族”<sup>②</sup>数量持续增加,演变为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可见,青年消极就业现象多出现在社会经济转型期<sup>[2]</sup>。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即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一方面,中国多年的经济发展与积累为年轻人提供了多样化的生活选择,他们既可通过相对稳定的工作维持基本生活,也可依赖前期积累过安逸生活。部分摒弃传统观念的年轻人选择回避社会竞争,仅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过“躺平”生活。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产业结构深度调整,行业发展

**[收稿日期]** 2024-12-26; **[修回日期]** 2025-03-24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校企合作背景下财经类高校创新创业校外实践基地建设”(231000353242246);广东省青少年研究共建课题“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广东省大学生返乡创业典型经验与政策建议研究”(2022GJ015);广东财经大学学生工作课题“五育并举背景下高校培育优良学风路径研究”(粤财大学工〔2024〕11号)

**[作者简介]** 李威威,男,安徽泗县人,广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就业政策,联系邮箱:liweimei2016@gdufe.edu.cn;龙腾,男,江西抚州人,广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空间受限,职业竞争加剧,“内卷化焦虑”使年轻人易对工作产生消极态度,并通过“躺平”来应对社会竞争。显然,年轻人的“躺平”行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效应。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等多重压力,相较于“未富先老”这一历史背景下的客观趋势,年轻人“未富先躺”导致的自愿失业问题同样值得重视<sup>[3]</sup>。在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年轻人的创造性贡献是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激励年轻人充分发挥创造力,增强其归属感与自我价值感,对转型期的中国至关重要。

基于此,本研究以年轻劳动力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导致年轻劳动力“躺平”的内在因素是什么?第二,年轻劳动力在社会生活中主要面临哪些风险与压力,这些因素如何作用于其就业意愿?第三,不同劳动力群体在就业意愿上受到的社会压力有哪些?本研究基于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从经济地位、主观情绪及社会交往等三个维度,分析可能影响年轻劳动力的因素,并通过实证研究探讨社会压力对其就业意愿的作用机制。

## 二、理论回顾与假设提出

### (一)“躺平”现象的逻辑动机

劳动力失业通常分为两类:自愿失业与非自愿失业。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将非自愿失业归因于“需求不足导致的失业”<sup>[4]</sup>,劳动力虽具备就业意愿并接受当前的工资与工作条件,却因经济周期性衰退而无法就业,陷入失业状态。而庇古提出的自愿失业则相反,劳动力虽具备专业能力并存在就业机会,仍主动放弃就业。劳动者选择自愿失业,通常源于对当前的工资水平不满、抵触现有职业体系或逃避社会压力。这种倾向在年轻人初入职场时尤为突出。由于经济结构与失业率密切相关,经济学研究多聚焦于非自愿失业,而自愿失业常被视为自然失业率的组成部分,并非劳动力就业研究的核心。但当前,“躺平”“佛系”“丧文化”等词汇在社会广为流传,年轻劳动力选择自愿失业的人数持续上升,自愿失业占总失业人口的比例持续增长。这促使人们开始反思具有社会性与集体性特征的“躺平”现象的形成机制。

部分学者认为,“躺平”现象反映了年轻人对就业的逃避倾向,体现出受社会消极文化影响的颓废心态。这种“与世无争、安然处之”的心态,折射出年轻人的悲观主义倾向及消极价值取向<sup>[5]</sup>。早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独生子女家庭成为社会主流,父母过度溺爱导致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独立性与责任感,在初入社会时因各种原因放弃就业,成为“啃老族”<sup>[6]</sup>。另有学者认为,年轻人作为社会行动者,具备认知与反思能力,其选择消极就业或自愿失业,可视为规避低水平趋同与内耗的自我保护策略或追求经济地位的策略性行为<sup>[7]</sup>。

年轻劳动力的“躺平”现象为研究就业意愿提供了直观视角。这种“躺平”行为的真实动因是什么?年轻人选择消极就业,可否视为一种风险规避策略?从经济学视角看,劳动者在利益最大化驱动下,会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理性决策。年轻劳动力选择消极就业或自愿失业,通常源于就业环境不佳、就业信息不对称及过高职业期望等多重因素。在综合评估人力资本市场需求、个人条件及职业体系后,部分人基于经济理性,认为进入求职特定状态是当前的最优选择,从而出现“躺平”现象<sup>[8]</sup>。因此,年轻劳动力消极就业或自愿失业的“躺平”,不应简单归为个体或群体品行问题,而应从社会经济结构对就业意愿的深层作用出发,剖析其行为逻辑。

### (二)工作保障压力与就业意愿

工作保障是劳动者在择业时优先权衡的因素之一。在现行工资制度下,个人的工作保障水平(涵盖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与就业后的在职时长

和收入水平密切正相关。从资本投入视角看,健全的工作保障体系能够有效降低劳动者的额外支出,进而提升其持续留任当前岗位的意愿<sup>[9]</sup>。工作保障制度的积累特性显著增强劳动者的就业意愿。青年因处于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往往缺乏工作年限和物质资本的积累,相较于中老年群体,年轻人的自我保障能力明显不足。因此,在择业阶段,青年倾向于选择有健全保障的工作岗位。反之,当劳动者处于保障力不足的岗位时,对失业和伤病的焦虑情绪以及对更优生活的心理期待,往往削弱其就业意愿<sup>[10]</sup>。

由此提出假设 1: 工作保障压力对劳动者的就业意愿具有负向影响。

### (三) 主观情绪压力与就业意愿

主观幸福感常被用作评估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sup>[11]</sup>。通常情况下,稳定的工作环境、自主择业权及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能够提升就业满意度,进而降低青年因失落感引发的自愿失业倾向。劳动者的主观情绪压力可能源于几个方面:第一,比较心理。在就业质量或工作条件存在差异时,部分青年会将自身与条件更优越的同龄人对比,进而认为自身工作强度较大、稳定性不足,由此产生职业自卑感或就业倦怠情绪<sup>[12]</sup>。第二,年龄。随着年龄增长,子女教育、家庭消费及赡养父母等支出的持续增加促使年龄较大的劳动者为维持家庭生计坚持就业,其就业意愿显著增强<sup>[13]</sup>。而刚步入社会的青年劳动者,因家庭经济压力较轻,常处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在“年轻即资本”的心理驱动下,他们更易倾向于自愿失业。第三,阶层归属感与社会认同感。青年劳动者的身份认同感往往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sup>[14]</sup>。在就业决策中,阶层认同、户籍属性及语言能力是寻求社会认同的重要维度,社会认同感越强,就业幸福感越高。此外,人情社会是中国社会关系的典型特征,“面子”往往成为劳动者评估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要依据,青年男性劳动者尤为重视“面子”。当“面子”受损时,他们易产生负面情绪,自愿失业倾向随之增强。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 劳动者对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低认同会削弱其就业意愿;

假设 3: 劳动者年龄越小,主观情绪影响越显著,就业意愿随年龄增长而增强;

假设 4: 相较于女性,男性劳动者受主观情绪的负面影响更显著,就业意愿更易下降。

### (四) 社会排斥压力与就业意愿

当劳动者的社会活动局限于家庭空间时,可能引发社会隔离或孤立现象,表现为不愿走出家庭融入社会关系网络,并逐渐形成对社会交往的排斥心理。反之,这种社会隔离或孤立会使劳动者逐渐丧失有效的社会支持,最终滋生拒绝工作和就业的心态<sup>[15]</sup>。根据前述理论分析,青年劳动者处于经济和社会资源积累的初始阶段,难以融入社会关系网络,因而面临较高的社会排斥风险。从社会融合理论分析,一方面,正常的社会交往是个人融入社会关系网络的关键途径。当青年无法实现正常的社会交往时,易产生自我隔离和退缩心态,“蛰居族”正是这一现象的典型表征。另一方面,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人情资本和情感支持可转化为潜在的就业机会。然而,社会隔离使青年无法获取“机会网络”的红利,导致其在劳动力市场难以匹配适宜的就业机会,进而陷入自我否定和情绪内耗,最终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sup>[16-17]</sup>。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5: 社会排斥压力会削弱青年劳动者的就业意愿。

## 三、研究设计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的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 2018 年实施的全国劳动力动态监测报告 (CLDS)。在此之前,该中心已完成 2012 年的全国基准调查及 2014 年与 2016 年的追踪调查。该调查

覆盖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采用问卷方式,对 368 个社区中 13 501 户家庭的 16 537 名 15~64 岁劳动者进行了数据收集。内容涵盖劳动者的经济状况、教育背景、户籍状况、迁移经历、就业情况、农业生产及社会活动参与等多个维度,数据全面,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本研究聚焦青年劳动者自愿失业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因而选取 16~35 岁青年劳动者作为研究对象,在剔除缺失变量样本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 1 779 个。

## (二) 变量设计与选取

### 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劳动者的就业意愿。CLDS 调查中关于就业意愿的题项包括:“您目前是否希望拥有一份工作(全职或兼职均可)?您是否计划在一年内找到工作?您认为工作对您的重要性如何(重要性分为四个等级)?”其中,前两个题项为二分类变量,第三个题项为有序变量。本研究采用概率加权法,将就业意愿转化为连续变量。

### 2. 核心自变量

**工作保障压力:**测量基于问卷中的题项“您是否享有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若受访者享有任一保险(福利),则赋值为 0,否则赋值为 1。随后,通过加权综合计算压力指数,指数值越大,压力水平越高。

**主观情绪压力:**测量基于问卷中的题项“您是否感到生活幸福?您对生活状况是否满意?您对家庭经济状况是否满意?您对生活的自由程度如何评价?您认为家庭的社会地位如何?您感受到的工作压力如何?您认为个人的社会地位如何?您认为生活水平与工作努力的公平性如何?”对上述题项进行加权汇总后,采用标准化方法处理,将指数范围限定在 0~1 之间,指数值越大,压力水平越高。

**社会排斥压力:**测量基于问卷中的题项“您有多少可以诉说心事的朋友?您有多少可以借钱(以 5 000 元为标准)的朋友?您对邻里的熟悉程度如何?您对邻里的信任程度如何?您与邻里的互助程度如何?”对于前两个正向题项,我们采用极差法将其转化为逆向指标。加权汇总后,对数据采用标准化方法处理,将指数范围限定在 0~1 之间,指数值越大,压力水平越高。

### 3. 控制变量

在模型估计中,本研究尽可能控制了与就业意愿相关的个体特征变量。参考修耀华<sup>[17]</sup>和武优劭<sup>[18]</sup>的研究,我们选取以下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兄弟姐妹数量、户籍类型、受教育程度、职业经历、子女数量。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选取描述情况

| 指标类别   |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指标解释                          |
|--------|---------|---------------|-------------------------------|
| 被解释变量  | 就业意愿    | 现在是否有找工作的意愿   | 想找工作=3; 暂时没有想法=2; 不想找工作=1     |
|        |         | 未来是否有找工作的意愿   | 想找工作=3; 暂时没有想法=2; 不想找工作=1     |
|        |         | 工作对您的重要程度     | 很重要=4; 比较重要=3; 比较不重要=2; 不重要=1 |
| 核心解释变量 | 社会保障    | 是否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 无保险=1; 有保险=0                  |
|        |         | 是否有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 无保险=1; 有保险=0                  |
|        | 压力      | 是否有住房公积金      | 无保险=1; 有保险=0                  |
|        |         | 是否有工伤保险       | 无保险=1; 有保险=0                  |
|        |         | 是否有生育保险       | 无保险=1; 有保险=0                  |
|        | 是否有失业保险 | 无保险=1; 有保险=0  |                               |

续表 1

| 指标类别   |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指标解释                                  |                   |
|--------|---------------------|---------------------|---------------------------------------|-------------------|
| 核心解释变量 | 主观情绪压力              | 生活过得是否幸福            | 不满意=5; 比较不满意=4; 一般=3; 比较满意=2; 很满意=1   |                   |
|        |                     | 对生活状况是否满意           | 不满意=5; 比较不满意=4; 一般=3; 比较满意=2; 很满意=1   |                   |
|        |                     | 对家庭经济状况是否满意         | 不满意=5; 比较不满意=4; 一般=3; 比较满意=2; 很满意=1   |                   |
|        |                     | 生活的自由程度             | 分为等级 1~10, 数值越高, 自由度越低                |                   |
|        |                     | 家庭的社会层次             | 分为等级 1~10, 数值越高, 社会层次越低               |                   |
|        | 生活水平和在工作上的努力比起来是否公平 | 自己的社会层次             | 分为等级 1~10, 数值越高, 社会层次越低               |                   |
|        |                     | 生活水平和在工作上的努力比起来是否公平 | 不公平=3; 说不上公平还是不公平=2; 公平=1             |                   |
|        |                     | 社会排斥压力              | 诉说心事的朋友数量                             | 数量≥0              |
|        |                     |                     | 能够借钱(5 000 元为标准)的朋友数量                 | 数量≥0              |
|        |                     |                     | 邻里熟悉程度                                | 不熟悉=3; 一般=2; 熟悉=1 |
| 邻里信任程度 | 不信任=3; 一般=2; 信任=1   |                     |                                       |                   |
| 特征变量   |                     | 邻里互助程度              | 非常少=5; 比较少=4; 一般=3; 比较多=2; 很多=1)      |                   |
|        |                     | 年龄                  | 15≤岁数≤35                              |                   |
|        |                     | 性别                  | 男性=1; 女性=0                            |                   |
|        |                     | 婚姻状况                | 已婚=1; 未婚=0                            |                   |
|        |                     | 兄弟姐妹数量              | 数量≥0                                  |                   |
|        |                     | 户籍类型                | 城镇=1; 农村=0                            |                   |
|        |                     | 受教育程度               | 小学及以下=1; 初中=2; 高中及中专=3; 大专=4; 本科及以上=5 |                   |
|        |                     | 职业经历                | 工作过=1; 未工作过=0                         |                   |
|        |                     | 子女数量                | 数量≥0                                  |                   |

### (三) 模型设定

为了估计社会压力对年轻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程度, 本研究以就业意愿为因变量来进行定量研究。模型方程设置为:

$$\text{Unemp}_i = \beta_a^h \text{Sec\_risk}_i + \delta^h X_i + \varepsilon_i^h \quad (1)$$

$$\text{Unemp}_i = \beta_a^h \text{Emo\_risks}_i + \delta^h X_i + \varepsilon_i^h \quad (2)$$

$$\text{Unemp}_i = \beta_a^h \text{Soc\_risk}_i + \delta^h X_i + \varepsilon_i^h \quad (3)$$

其中,  $\text{Unemp}_{i,t}$  为第  $i$  个受访者的就业意愿,  $\text{Sec\_risk}_{i,t}$  表示社会保障压力等级,  $\text{Emo\_risks}_{i,t}$  表示主观情绪压力等级,  $\text{Soc\_risk}_{i,t}$  表示社会排斥压力等级,  $X_{i,t}$  为控制变量的向量,  $\varepsilon_i^h$  为模型随机扰动项。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基准回归结果

本研究首先采用 OLS 方法, 分析青年劳动者在面对工作保障压力、主观情绪压力和社会排斥压力时, 其就业意愿的变动情况。模型(1)至(3)未纳入控制变量, 而是逐级分析三种社会压力指数对就业意愿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 工作保障压力指数与主观情绪压力指数对就业意愿均具有显著负向效应。具体而言, 工作保障压力指数每上升 1 个百分点, 劳动者就业意愿下降 0.9%~1.0%; 主观情绪压力指数每上升 1 个百分点, 劳动者就业意愿下降 2.6%。尽管社会排斥压力指数对劳动者就业意愿也呈现负向效应, 但其影响幅度小于 0.1%, 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故不具统计意义。模型(4)在纳入个体特征控制变量后, 尽管三种压力指数的系数随控制变量的加入略有增加, 但其估计系数的正负方

向与此前一致。工作保障压力指数与主观情绪压力指数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仍显著为负，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中的假设 1 和假设 2：工作保障压力的上升及对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低认同显著降低了青年劳动者的就业意愿。对于假设 5，尽管社会排斥压力指数对就业意愿呈现负向效应，表明社会排斥压力可能削弱青年劳动者的就业意愿，但其结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包括几个方面：第一，年轻人在接受新生事物方面具有天然优势，适应能力较强且社交意愿较高。因此，从年龄分布看，陷入社交隔离状态的青年在各年龄段占比偏低，青年劳动者遭受社会排斥的可能性较小。第二，社交平台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向型年轻人的社交焦虑。即使在现实中较为孤僻的青年，网络也能高效地满足其社交需求。因此，青年劳动者当前因社会隔离而选择自愿失业的可能性较低。从劳动者的年龄特征分析，就业意愿随年龄增长呈现倒 U 型变化趋势。这验证了假设 3：劳动者年龄越小，主观情绪的影响越显著，就业意愿越低；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者因家庭支出的增加而倾向于避免失业，就业意愿随之增强。

表 2 基准模型实证分析情况

| 变量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模型(4)                 |
|-----------|-----------------------|-----------------------|-----------------------|-----------------------|
| 社会保障压力等级  | -0.009***<br>(-2.750) | -0.010***<br>(-2.850) | -0.010***<br>(-2.810) | -0.008**<br>(-2.110)  |
| 主观情绪压力等级  |                       | -0.026***<br>(-3.320) | -0.026***<br>(-3.320) | -0.013*<br>(-1.750)   |
| 社会排斥压力等级  |                       |                       | -0.001<br>(-0.020)    | -0.001<br>(-0.110)    |
| 年龄        |                       |                       |                       | -0.021***<br>(-5.620) |
| 年龄的平方     |                       |                       |                       | 0.001***<br>(4.950)   |
| 常数项       | 0.879***<br>(361.700) | 0.896***<br>(162.580) | 0.896***<br>(153.220) | 1.149***<br>(27.870)  |
| 控制变量      | 否                     | 否                     | 否                     | 是                     |
| 观测值       | 1 779                 | 1 779                 | 1 779                 | 1 779                 |
| R-squared | 0.112                 | 0.112                 | 0.110                 | 0.114                 |

注：\*\*\*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括号为  $t$  值。下表同。

## (二) 异质性特征分析

### 1. 性别差异

为考察不同群体在面对社会压力时的就业意愿差异，本研究将青年劳动者分为男性与女性两组进行对比分析。为排除年龄的潜在影响，将控制变量中的年龄及年龄平方予以固定。模型结果见表 3：在男性青年劳动者群体中，工作保障压力与主观情绪压力对就业意愿均呈显著负向效应；而在女性青年劳动者群体中，虽负向效应方向一致，但其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 4：相较于女

表 3 性别异质性实证分析

| 变量        | 性别                   |                     |
|-----------|----------------------|---------------------|
|           | 男性                   | 女性                  |
| 社会保障压力等级  | -0.012**<br>(-2.240) | -0.005<br>(-1.190)  |
| 主观情绪压力等级  | -0.020*<br>(-1.740)  | -0.004<br>(-0.390)  |
| 社会排斥压力等级  | 0.007<br>(0.520)     | -0.008<br>(-0.890)  |
| 常数项       | 1.184***<br>(17.300) | 1.092***<br>-20.020 |
| 观测值       | 680                  | 1.099               |
| R-squared | 0.207                | 0.082               |

注：\*\*\*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 。

性, 男性青年劳动者因“面子”问题对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更具敏感性。当其经济社会地位受损时, 就业意愿显著下降。

## 2. 兄弟姐妹数量差异

表 4 呈现了在不同兄弟姐妹数量下, 青年劳动者在面对社会压力时就业意愿的差异。根据受访者的家庭人口数据, 将样本分为三组: 独生子女或 1 个兄弟姐妹、2~3 个兄弟姐妹以及 4 个及以上兄弟姐妹。模型结果见表 4: 独生子女或仅 1 个兄弟姐妹的青年劳动者, 其社会压力对就业意愿的负向效应更为显著; 而在兄弟姐妹数量较多(4 个及以上)的家庭中, 青年劳动者所受的影响未达统计显著性。对此有一种合理解释, 即独生子女或兄弟姐妹较少的家庭的物质条件较优越, 青年劳动者无须承担过多的家庭责任, 在面对社会压力时, 他们更倾向于以个人感受为主, 表现出更强的风险规避倾向。

表 4 家庭成员数量异质性分析

| 变量        | 兄弟姐妹数量              |                      |                     |
|-----------|---------------------|----------------------|---------------------|
|           | 0~1 个               | 2~3 个                | 4 个及以上              |
| 社会保障压力等级  | -0.008*<br>(-1.850) | -0.010<br>(-1.400)   | 0.007<br>(0.350)    |
| 主观情绪压力等级  | -0.016*<br>(-1.660) | -0.009<br>(-0.710)   | -0.011<br>(-0.330)  |
| 社会排斥压力等级  | 0.005<br>-0.560     | -0.013<br>(-0.910)   | -0.029<br>(-0.780)  |
| 常数项       | 1.226***<br>-23.720 | 1.024***<br>(13.330) | 1.061***<br>(4.930) |
| 观测值       | 1 110               | 556                  | 113                 |
| R-squared | 0.137               | 0.096                | 0.078               |

## 3. 户籍差异

表 5 呈现了在不同户籍类型中, 青年劳动者在面对社会压力时就业意愿的差异。模型结果见表 5: 城镇户籍的青年劳动者在面对工作保障压力时, 其就业意愿显著下降, 而城镇劳动者在其他压力条件下, 以及农村劳动者对社会压力的反应均未达统计显著性。这一结果可能源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逐步调整, 许多地区已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 统一登记为居民户籍。这表明城乡户籍限制逐步弱化, 城乡二元经济的边界逐渐模糊。在就业选择中, 青年劳动者的阶层认同、户籍类型和语言能力是寻求社会认同的关键因素。户籍制度改革使城乡劳动者的阶层认同感与社会认同感逐步趋同。随着劳动者社会认同感的提升, 其就业幸福感随之提高, 户籍限制对青年劳动者流动就业的负向影响逐步减弱。

表 5 户籍异质性实证分析

| 变量        | 户籍性质                 |                      |
|-----------|----------------------|----------------------|
|           | 城镇                   | 农村                   |
| 社会保障压力等级  | -0.010*<br>(-1.740)  | -0.004<br>(-0.900)   |
| 主观情绪压力等级  | -0.010<br>(-0.690)   | -0.013<br>(-1.540)   |
| 社会排斥压力等级  | 0.021<br>(1.490)     | -0.008<br>(-0.950)   |
| 常数项       | 1.179***<br>(14.340) | 1.147***<br>(24.060) |
| 观测值       | 400                  | 1 379                |
| R-squared | 0.195                | 0.097                |

### (三) 稳健性和内生性分析

为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前文

基准回归以“工作意愿、求职意愿和工作重要性”为就业意愿的代理指标,并以问卷中的“未工作时长”为替代因变量,进行逐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各解释变量的系数方向与基准回归一致,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回归结果稳健。此外,上述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偏误。劳动者就业意愿作为主观行为决策,受到遗漏变量与就业意愿的相关性影响,且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因此,本研究将样本中35~45岁受访者的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进行检验。根据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在引入工具变量后,工作保障压力指数、主观情绪压力指数和社会排斥压力指数对就业意愿的影响方向与基准回归一致,表明结果具有一致性。

##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本研究采用Pooled OLS方法分析青年劳动者在面对工作保障压力、主观情绪压力和社会排斥压力时就业意愿的变动情况。结果表明:①工作保障压力的上升及对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低认同显著降低了青年劳动者的就业意愿,而社会排斥压力的影响不显著。青年劳动者普遍缺乏自我保障能力,在面对压力时难以获得有效支持,进而加剧就业焦虑。同时,当主观感知经济社会地位难以获得认可时,年轻人往往缺乏工作信心,就业意愿随之减弱。②青年劳动者受主观情绪压力影响更显著,就业意愿随年龄呈现倒U型趋势。相比之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支出持续增加,就业意愿随之增强。此外,男性青年劳动者因更关注经济社会地位,其就业意愿受社会压力的负向影响更强。③青年劳动者的就业意愿受家庭资源约束。相较于兄弟姐妹数量较多者,独生子女的社会压力对就业意愿的负向效应更显著。资源集中的小家庭更易娇惯子女,使其在求职受挫时倾向于逃避就业。④随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弱化,城乡劳动者的阶层认同感趋同,户籍制度的影响显著减弱。这表明人口结构已进入新阶段,未来需重点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完善配套措施,以更好地释放人口红利。

本研究旨在非简单地道德评判青年“躺平”行为,而是以同理心分析其成长中的困境,进而探讨如何在快速变革的社会中为青年构建更包容、可持续的就业环境。“躺平”行为本质上是行动者在权衡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因此,解决这一问题需秉持系统性思维,认识到促进就业既需激发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也需优化外部支持环境,既要立足当前、多措并举缓解毕业生的现实困境,又要放眼长远、通过体制机制精准施策,为青年成长与发展持续拓展空间。

## 注释:

- ① “尼特族”泛指那些年龄在16至35岁之间,既不升学也不就业,且未接受培训的青年群体。他们的生活状态是缺乏工作与社交,精神世界则被“焦虑”“痛苦”“失眠”和“孤独”等情绪所笼罩。
- ② 蛰居族起源于日本,字面意思为“隐退、抽离”或“隐蔽、社会退缩”。日本内阁府将其定义为几乎不走出自家或房间,且除满足基本需求外不外出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

## 参考文献:

- [1] 陈蓓丽,曹锐.城市失业年轻劳动力特征及失业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延迟满足理论的解释[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6(4):103-111.
- [2] 大前研一.低欲望社会:“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M].姜建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 [3] 黄亚婷,刘子涵.世界一流大学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动因、策略与成效:基于结构化理论分析框架的考察[J].外国教育研究,2024,51(11):93-110.
- [4] 刘兆光.智能社会就业促进法律问题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22.
- [5] 陈瑞燕.三重场域与大学毕业生再社会化危机的过程分析:基于“蹲啃青年”现象的调查[J].当代青年研究,2024(4):

15-25, 37.

- [6] 刘保中, 臧小森. 转型理论视域下未就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心态与生活状态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9): 51-60, 24.
- [7] 谭霆萌. 亚文化视域下青年“躺平”现象研究[D]. 武汉: 湖北文理学院, 2023.
- [8] 李鹏, 夏彤. 新就业形态生成逻辑、趋势研判与协同治理研究[J]. 人口与社会, 2024, 40(4): 16-28.
- [9] 蔡昉. 社会保障的与时俱进: 理念、范式和政策工具[J]. 社会保障评论, 2024, 8(4): 3-17.
- [10] 王钰莹. 理工类高校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影响因素与提升对策研究[D]. 秦皇岛: 燕山大学, 2022.
- [11] 李阳. 消费为媒: 灵活就业群体主观幸福感的传导机制研究[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4(5): 122-133.
- [12] 刘任静. 新时期高职思政与就业指导协同发展研究[J]. 就业与保障, 2024(9): 100-102.
- [13] 拜茹, 喻贞, 于长永. “80后”劳动力的失业风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8(2): 125-134.
- [14] 徐旻霞. 无债一身轻?: 房产、住房负债与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12): 48-57, 67.
- [15] 杨茨彬, 沈丹. 社会生态视角下大学生就业支持系统的评估与优化: 以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为例[J]. 中国成人教育, 2022(8): 22-27.
- [16] 陈晓东. 机会不平等对个体就业概率的影响: 基于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J]. 现代经济探讨, 2024(6): 39-48.
- [17] 李威威. 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学生返乡创业问题研究: 基于广东粤西地区的实证分析[J].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2025, 42(1): 95-101.
- [18] 修耀华. 论中国特殊群体的社会保护政策: 青年劳动者社会保障制度研究[J]. 探索, 2010(6): 135-139.
- [19] 武优勳. 公共服务集聚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 财经科学, 2020(6): 120-132.

## Why do young people “lie down” in employment?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pressure on employment intention

LI Weiwei, LONG Teng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angzhou 51053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ata from the 2018 China Labor Dynamics Survey (CLDS2018),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social pressure on the employment intentions of young worker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creased job security risk pressure and low socioeconomic identity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employment intentions of young workers, whereas social exclusion pressure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As individuals age, the labor force tends to avoid unemployment due to increasing family expenses, resulting in stronger employment intentions. However, young male workers are more concerned with their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due to “face” issues, and social pressure exerts a deeper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ir employment intentions. The employment intentions of single child are weaker than those of individuals with multiple siblings,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strictions are not the primary cause of differences in employment intention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young workers.

**Key words:** labor force; employment intention; job security; social pressure

[编辑: 苏慧]